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与综合

樊纲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与综合

樊纲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樊纲著. —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ISBN 978-7-5432-2648-7

I. ①现… II. ①樊…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2126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装帧设计 陈 楠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

樊纲 著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40,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48-7/F·947

定价 58.00元

## 出版说明

出版作为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凝结，集聚了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的经验与成果，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飞速发展的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并未削弱出版业的这一功能，反而前所未有地促进了其创新发展。

长期以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始终以弘扬主旋律、引领学术思潮、关注时代命题为己任，并围绕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理论问题举办“世纪中国论坛”。结合2016年“世纪中国论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融合移动端、语音端等新技术，以纸电一体同步发布的方式隆重推出《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实现了出版方式与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的融合发展，表达了出版人在奉献好书的同时，努力践行社会责任、文化理想的使命追求。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聚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题，荟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奖得主和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等中外著名经济学家的扛鼎之作，著译并重，经典闪耀。

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英文版中就预言，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长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恢复它在 1890 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2014 年，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 20 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为图书新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特别指出：“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 20 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然而，中国经济自 2012 年增速明显减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奇迹或增长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否改变？对于未来，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信心？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吴敬琏在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一版（2005 年）中，就指出了转型、结构调整不能取得成效的很多具体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抑制或排除了市场的作用。他在第四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在 21 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转型。”

无独有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先驱巴里·诺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全面描述和评价了 1949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并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显然，制度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各自的经典作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与《比较制度分析》中，分别从东西方的不同视角阐释了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绩效中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曼瑟·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则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这一分析经济增长的前沿性概念，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

对于那场起始于亚洲的金融危机，沈联涛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并警示我们2017年可能发生的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高杠杆问题，瑞典的邓达德等在《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一书中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并因此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推荐为2015年度图书。

根据“十三五”规划的蓝图，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必由之路，其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启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将以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传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编委会

2016年7月

## 再 版 前 言

---

1990年,我的两本专著由当时的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25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格致出版社计划再版,在此写一小序,也是表达对出版社的感谢之情!

25年后面对当时的文字,最自然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的理论观点还正确么,需要纠正什么错误么?25年来有什么发展与提高?我的回答如下:

第一,当时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分析,现在看也还是正确的,并不过时。当时形成这些观点和理论分析,应该说是我十年研读经济学、思考经济问题的成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主张,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现在看来,还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特别是《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在看来除了数学表达上有所欠缺之外,分析都是正确的。25年前分析的那些事,现在在一部分经济当中还在反复地发生,只是规模与形式有所变化。一种制度在,一种行为逻辑就仍会在,不会有错,理论不过是揭示了这一逻辑。比较遗憾的是,当年《大纲》出版后有的国外机构想资助出英文版,都请人翻译了初稿,但一是由于时间紧,对翻译稿不满意又没有时间自己动手写,二是由于苏东剧变,想到此书的国际市场已大大缩小,就放弃了。当下,中国又在进行新一轮



的体制改革,在努力解决 25 年来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或解决好的大大小小的  
一些问题。自己认为这本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的  
意义。

第二,25 年当然有发展,有提高。现在让我再写《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  
比较与综合》,就可以丰富得多了。最重要的进步是,经过 25 年亲历中国  
经济发展的过程,有了对工业化早期直至现在各种经济现象的直接体验,我  
觉得我已经能够体会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学派的学  
者在当初的欧洲为什么产生了那些理论思想,经济学理论是怎样在西方  
经济的漫长历史中,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  
天的。而如今的我们,正在重新经历着发达国家早期同样的历程,虽然有着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成长的烦恼”,却也有着“落后的优势”,可  
以从今天的角度,对前人的一切理论和思想,做更为生动的综合,也可由  
此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我们后人的一份贡献。不过这些完全可以是一  
本书的内容了,今天也很难对 25 年前的著述做什么修补。

此外,可以多说一句的是,25 年来,我不曾写过“应景的”文字,凡  
是写出来发表的,都是经过思考自己认为正确的,所以也没有那种根据  
今天的景色修正以前文字的尴尬。

最后,再次感谢格致出版社,感谢 25 年前亲自对我的两本书进行  
组织编辑工作的陈昕先生!

樊 纲

2015/1/4



# 序

---

从1902年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中文算起,西方经济学被引进我国,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西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学界占据了统治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更有大量的西方经济理论被介绍给国内理论界。引进了许多理论,如何消化、掌握、融会贯通,如何对各种理论本身,对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而正确地加以利用,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却一直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也是摆在世界上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樊纲的新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无疑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大胆、可贵的新探索。

## 1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主流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就其实证内容而不是价值判断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年来不断被世界上经济学家们提出来讨

论的问题，因而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回答。

一种过去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其他各种经济理论都属于“庸俗经济学”，是“伪科学”，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仅就忽视对社会经济矛盾的研究，不去努力揭示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维护现存制度这一点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符合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定含义。但是，正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中指出的，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利用有限物质资源满足各种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研究对象是多方面的，经济科学本身也就应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一种经济理论，如果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前提下对人与物的关系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解有关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把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推向了前进，有利于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经济问题，它就具有一定的科学真理性，同样构成经济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伪科学”之类的概念对其进行“定性”或区分，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科学的。

另一种也曾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经济运动的实质（社会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则是经济运动的形式（物质关系），因而前者揭示了经济现象的本质，而后者只能描述现象；西方经济学中起基本解释作用的效用偏好之类的概念，也都是些“现象形态”。这种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这里首先要认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物质需要与物质生产活动本身的相互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活动，同样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交往的动因和前提；社会经济关系，最终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经济学不等同于历史哲学，但根据这种哲学观点，我们至少不能说物质关系或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现象形态”。就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而言，如价格、需求、供给、经济增长等等，都是由多种基本的、内在的经济因素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矛盾，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人们对物品的效用偏好、投入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等等，同样是重要的、内在的、非“现象”的因素，也是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的一些深层的、“实质”性的基本因素；不对这些因素本

身及其在经济运动、经济变量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有时是抽象的分析,我们同样不能完整而科学地说明各种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分析了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矛盾在经济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对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则深入分析了人的物质需求偏好结构、现存生产技术对经济变量的决定作用,深化了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这同样是必需的,是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且,这种分析也属于对现象背后的一些内在因素的分析,并不仅仅是现象描述。因此,正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所指出的,用“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也是不恰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主要研究了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具体运行过程。这种观点失之偏颇的原因则在于没有注意到,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明离不开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因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利益矛盾,正是通过经济运行机制而进行和展开的。同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各种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就是经济运行机制;脱离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也就无法用经济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都是先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然后又在说明了基本关系之后进一步说明社会利益矛盾是如何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决定各种经济变量、产生各种经济现象的。因此,说马克思没有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是不正确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指出,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具有多重的功能规定,既是经济利益矛盾实现和发展的机制,也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经济理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分析了经济运行机制,而在于着重分析了它的某一种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将经济运行机制作为人与人的利益矛盾实现和发展的机制进行了考察,而新古典主义等理论则着重将其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行了考察。这一论点显然更符合逻辑。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不同经济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范围”(ranges):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基于内在矛盾而发

展演变的逻辑；而西方正统理论研究的则是现实“日常经济生活”的规律。这是最早由奥斯卡·兰格博士1935年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观点，至今在西方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经济学家中也颇为流行。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目的主要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各种现象，为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维持现存制度提出“对策”。但是，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与理解日常经济问题无关。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关于社会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现象，如经济周期、失业、通货膨胀，甚至价格决定等，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说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关于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等理论的研究，对于认识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没有积极的意义。

现在，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樊纲又提出了一个颇为独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对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把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加以肯定，然后着重考察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身，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决定经济变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将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背景条件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并主要用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明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正是因为不同经济理论的差别主要是研究角度和分析侧面的差别，它们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综合起来（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利用已有的各方面的理论，形成统一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加全面而科学地解释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变量，说明经济现象。

这一观点还刚刚提出，能否经得住理论家们的批评，能否经得住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史的进一步检验，自然还有待时日。但读者可以看到，书中对这一基本论点的论述是充分的、严谨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是建立在作

者对各种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方法的透彻理解,对经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应用这一论点重新考察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如长期争论的“价值—价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等)时,也是能够有所创新的,并因此而显示了这一论点的理论价值。

## 2

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社会,增进全民的福利,昌盛民族的未来,与这一目的直接相关的,自然是经济政策。但是,怎样才能研究制定出科学的、有效的经济政策?除了需要对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入的了解之外,特别需要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且,不仅需要与当前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具体理论,而且需要有对于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解释的基础理论。就像没有高能物理等基础理论为后盾,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一样,没有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深入了解,就不能提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越是在现实经济问题紧迫的时候,就越是不能忽视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4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犯了不少错误,以致远远地落在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后面。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上上下下都有一种紧迫感,经济学家们也想尽快地找出改革和发展的“治世良方”,政策研究成为“热门”,各种对策争相问世,这无疑对前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对策热”中,出现了忽视甚至轻视、荒疏基础理论研究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一方面,缺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更是成了“冷门”。有些人对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不愿去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读了一两本经济学著作(并且往往是一两本某一学派的著作),便以为掌握了全部经济学;尚未搞清楚一种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各種前提假设,就急于拿来应用于解决我国面临的特殊经济问题,结果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政策结论”,往往很难避免“下错了药”。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些情况中及时吸取教训了。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学界能否真正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摆脱离落后的面貌,利用现代经济学的一切科学成果,建立和发展起适合于说明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从

而为整个人类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我们自己的独到贡献；也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关系到能否沿着正确的道路尽快实现“四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没有科学的发展、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樊纲的这本《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其一大特色就在于基本上是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涉及的都是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读者不难发现，这些基本问题又都是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和当前的理论建设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的理论大厦就没有牢固的根基。作者这几年认真读书，苦心钻研，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从全书的选题到内容看，都是经得起一番推敲的，也表现出作者追根究底的精神。此书应该说是我国经济学界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虽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但这毕竟是一个可喜的开端。作为作者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我为他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欣慰；更希望他不懈努力，不负使命，争取更大的成就。

朱绍文

1988年9月于北京

# 前 言

---

## 1

当代的经济学理论界，流派林立，错综复杂，但仔细分析起来，能够真正称为形成体系的只有三家：100多年前由卡尔·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列昂·瓦尔拉斯开创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sup>①</sup>和50多年前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发展至今，仍作为三个重要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支撑着当代世界的经济学理论界。这三个体系的创始人当初提供的理论就很丰富，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开创的基础上更是建造起了宏大而复杂的理论大厦；许多年来，对这三种理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扩充的论著浩如烟海。因此，对这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分析、批评和比较，无异于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连同

---

① 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通常视马歇尔为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原因之一是由于瓦尔拉斯的著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英译本问世，因而他的全面的开创性贡献很晚才被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本书第1章第1节。



其 100 多年的历史重新考察一遍。可想而知,当我写下本书书名的时候,手中的笔有多么的重!

## 2

尽管专门对三种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著作,迄今为止并不多见,但人们已经在许多具体理论问题上对这三种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比较;各种理论之间的相互论战,事实上也可属于这种比较研究的范围。这些都构成本书重要的思想材料。

然而,至今人们对各种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大多属于以下两种类型。一类可称为“立异”,即研究各种理论的特点和相互差别,以表明其相互间的对立;最终的目的是要揭示某些理论的错误与偏颇,而证明另一种理论或者作者自己的理论之正确。在相互论战中的许多比较研究,都属这种类型。另一种可称为“求同”,即分析不同的理论如何存在着共同的东西,或者如何可以某种方式相互转化;最终目的是以某些理论的科学价值,来论证另一种理论的正确,或者证明某种理论观点的普遍真理性。比如,有的人论证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经适当重写便可转化为凯恩斯的宏观模型,便属于这种性质。所有这些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搞清各种经济理论本身及其相互争论的内容,有利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也的确反映了各种经济理论之间的某些方面的相互关系。

本书要作的比较研究,则可算作另一类型。书中将突出地强调各种经济理论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差别;但这样做的目的,却不是要表明它们是如何的对立,也不是要证明某种理论如何绝对错误,另一些理论又如何绝对正确,而是想说明各种理论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即由于它们在整体上迄今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都具有各自的科学的价值,从而如何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我们如何可以在正确认识它们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综合的利用,通过各种科学因素的有机结合,使经济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样的一种分析比较,或许可以称之为“标异而求补”。这种分析,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O.兰格 1935 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经济学》,便可算是包含着这种分析的一部较著名的著作;J.罗宾逊的一些论著也具有这种性质。

论证各种经济理论的“互补性”，追求某种有机的综合，这一工作本身必将超出单纯比较研究的范围，因为所谓有机的综合，不是杂乱的拼凑。一方面，它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且必然要以某一种理论作为综合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这本身也必然包含着理论的创造和再创造过程，提供某些新的理论因素和新的理论结构。本书下篇的内容很大部分就属于这种性质。因此，本书的一部分篇幅（特别是下篇）将用于正面阐述笔者自己在各种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不过由于本书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这方面将不求精细全面。在本书范围内，笔者将仅仅满足于提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的基本思想和在某些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初步探讨。

中文里（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综合”一词的贬义翻版是“折中”；而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内在逻辑的综合，也的确只能算作折中。因此，试图“综合”的工作便总会冒着被称为或本身滑向“折中主义”的风险。不过，我们只能冒些风险。重要的是认识到“综合”在思想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在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综合不仅构成必须有人来做的一项积极的工作，而且构成理论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可能失败，误入歧途，但作为一种探索，它至少能向人们表明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当然，这里指出存在风险的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提醒自己下功夫去探求理论综合的正确道路，努力使自己的比较研究不失去主导思想，使“综合”不流于“拼凑”。

### 3

这样一个对各种经济理论体系进行比较和综合的任务，服从于一定的理论目的。

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摆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重大理论课题：（1）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理论及其相互关系，如何搞清与说明理论史上和目前仍然存在的各种理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如何摆脱和克服在理论比较中非科学的、教条主义的狭隘偏见。（2）如何掌握和利用世界上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遗产和研究成果，建立、丰富、改进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状况（不仅落后于别人，也落后于我们自己的实践），使中国的经济学不